

鲁迅杂文

张杰【著】

而已丛书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粵迅雜考

张 杰【著】

市已丛书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迅杂考/张杰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
2006.9

(而已丛书)

ISBN 7-5334-4543-0

I. 鲁 II. 张… III. 鲁迅 (1881~1936) —
人物研究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05151 号

鲁 迅 杂 考

张 杰 著

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)

电话: 0591-83725592 83726971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rup.com.cn)

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7.75 印张 220 千字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 100

ISBN 7-5334-4543-0/K·115 定价: 29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请向出版科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张杰 1951年生，天津人。
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留
校工作一年后，调入北京鲁迅博
物馆研究室，参与编辑《鲁迅研
究资料》丛刊和《鲁迅研究月刊》
至今。出版著作两种，发表论
文、随笔百余篇。



“而已丛书”十一种

- 《我注鲁迅》 周楠本【著】
《鲁迅回想录》 周楠本【编注】
《鲁迅身后事》 朱 正【著】
《鲁迅笔名索解》 李允经【著】郁重今【印】
《鲁迅杂考》 张 杰【著】
《鲁迅教我》 王得后【著】
《鲁迅古籍藏书漫谈》（上、下卷） 韦 力【著】
《鲁迅评点古今人物》 肖振鸣【编】
《鲁迅评点中外名著》 肖振鸣【编】
《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》 王富仁【著】
《鲁迅十讲》 钱理群【著】

丛书策划 / 黄 旭 肖振鸣
丛书责编 / 祝玲凤
责任编辑 / 林冠珍
责任校对 / 刘世新
装帧设计 / 小 品
封面图案 / 鲁迅手绘猫头鹰

目 录

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杂考·····	(1)
《苦闷的象征》鲁迅译本初版时间考·····	(10)
《“题未定”草》题考·····	(16)
鲁迅讲演杂考·····	(21)
《穆天子传》鲁迅抄本考·····	(51)
鲁迅与乡邦文献及乡贤故书·····	(60)
鲁迅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·····	(80)
鲁迅拟校勘阮籍诗文集考·····	(106)
鲁迅与关中颜氏世家著述·····	(112)
鲁迅与《太平广记》·····	(119)
鲁迅与《青琐高议》·····	(134)
鲁迅与扬州学派中坚·····	(146)
鲁迅与“罗王之学”·····	(160)
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·····	(178)
鲁迅同船赴日同学考·····	(192)
鲁迅“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”考·····	(198)
关于“夹着毒罂”的笔战·····	(203)
蒋维乔·蔡元培·鲁迅·····	(207)

鲁迅与刘文典·····	(214)
鲁迅与宫竹心·····	(218)
鲁迅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“校务维持会”·····	(225)
鲁迅与约翰·密尔·····	(240)
鲁迅与菲律宾作家黎萨尔的小说·····	(245)
鲁迅与阿波利奈尔的《禽虫吟》·····	(250)
也谈鲁迅批评过的二位日本作家的会谈记·····	(254)
近年国外鲁迅研究扫描·····	(264)
后记·····	(275)

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杂考

《鲁迅全集》中涉及范爱农的作品共计三篇，即散文《范爱农》，诗作《哭范爱农》（《集外集》）和《哀范君三章》（《集外集拾遗》）。最近我在翻阅其他资料时，顺便看到了一些关于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的资料，发现《鲁迅全集》中所收的这两首诗还存在一定问题，感到有必要作一点考证。

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的关系

在《鲁迅全集》中，《哭范爱农》收入《集外集》，《哀范君三章》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。在《集外集拾遗》初版之前，恐怕很少有人怀疑《哭范爱农》不是一首独立成篇的诗作，但是《集外集拾遗》出版以后，问题就凸现出来。只要对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稍作比较，就可以发现前者与后者的第三首十分相似，所不同的只有两处。一是在《哭范爱农》第三联为“幽谷无穷夜，新宫自在春”。在《哀范君三章》的第三首中，第三联是“此别成终古，从兹绝绪言”。二是第二联中的首句，《哭范爱农》为“大圜犹酩酊”，《哀范君三章》中“酩酊”为“茗芋”。其他则完全一样。人们有理由相信，所谓《哭范爱农》事实上就是《哀范君三章》的第三首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中，《哭范爱农》

一诗的注释就是这样认定的，并且说明了原因。注释指出：“这是《哀范君三章》的最后一首。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，于本书编辑时补作，故与原发表时稍有出入。”这条注释说明了《哭范爱农》与《哀范君三章》中不同诗句的缘由，却也引出了新的问题：杨霁云在编辑《集外集》时为什么不将《哀范君三章》一并发表，而留待以后“补遗”呢？

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鲁迅在《范爱农》一文中的回忆：“夜间独坐在会馆里，十分悲凉，又疑心这消息并不确，但无端又觉得这是极其可靠的，虽然并无证据。一点法子都没有，只作了四首诗，后来曾在日报上发表，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。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，起首的四句是：‘把酒论天下，先生小酒人。大圜犹酩酊，微醉合沉沦。’中间忘掉两句，末了是‘旧朋云散尽，余亦等轻尘’。”将鲁迅这些回忆的诗句与《哭范爱农》中的诗句比较，一字不差。而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中《哭范爱农》的注释，恰好对鲁迅忘记的一联作了说明：“其中第三联因作者忘却，于本书编集时补作，故与原诗发表时稍有出入。”这里又提出了“补作”问题。

就管见所及，杨霁云有关《集外集》以及与鲁迅关系的文章共四篇，它们是《〈集外集〉编者引言》、《〈集外集〉编者杂记》、《谈〈集外集〉》、《琐记鲁迅》。但这些文章都未涉及《哭范爱农》。好在1934年12月13日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恰好填补了资料上的空白。此信分两部分，前半即《哭范爱农》诗，后半是致杨霁云信。此信可以证实：一、鲁迅忘记的第三联，即这时补作。二、诗题《哭范爱农》，也是这时鲁迅所加。只是诗题后的年代有误，将1912年误记为1913年。事实上，鲁迅当年所作的《哀范君三章》曾附录于《鲁迅日记》。只是由于年久失忆，才有“补作”之举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可以作合理推断：杨霁云拟将这首诗收入《集外集》时，既查不到当年的绍兴《民兴日报》，更不知鲁迅曾附录

于日记，也就无从知道《哀范君三章》全貌。仅从鲁迅已发表的散文《范爱农》一文中辑得六句，致信给鲁迅征询意见，最后由鲁迅完璧。这就是《哭范爱农》以“残诗”八句面貌“抢先”收入《集外集》的原因。现在看来，也正是由于有鲁迅的补作，才使它具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。

《哀范君三章》的 传抄与收集



鲁迅《哀范君三章》手稿及“稿后附书四行”

如果说《哭范爱农》

是依据《范爱农》一文的记述，加上鲁迅的补作而编入文集的，那么，《哀范君三章》收入文集的依据也并非坚实。现有资料表明，许广平在编辑《集外集拾遗》时，同样既未见到鲁迅手稿，也未查到最初发表《哀范君三章》的《民兴日报》。许广平对此诗来源的说明是：“录自《新苗》第十三册上遂先生的《怀旧》中。”上遂即许寿裳，他文中记述的鲁迅诗作源于何处呢？这涉及《哀范君三章》的传抄，而且还不止许寿裳一人。许寿裳对此诗的回忆是：“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罢，大风雨凄黯之极，他张了伞走来，对我们说：‘爱农死了。据说是淹死的，但我疑心是自杀。’于是给我们

看昨夜所作的《哀诗三首》……”此文作于1936年12月19日。

周作人在1938年2月13日所作的《关于范爱农》一文中，对《哀范君三章》也有记述，而且更详尽，更丰富，更言之有据。首先，此文不仅记录了《哀范君三章》，而且记录了鲁迅“附书四行”和发表时的署名为“黄棘”。其次，文章明确说明所据为鲁迅手稿：“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”，“护书中又有鲁迅的《哀范君三章》手稿”。第三，文章还无意间透露，当年鲁迅将诗稿寄给作者，作者抄录后又附了一首自作诗《哀范爱农先生》，一并送给《民兴日报》社发表：“抄本只有诗三章，无附言，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，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。”这与《鲁迅日记》1912年8月28日载：“收21日及22日《民兴日报》一分，盖停版以后至是始复出，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。”完全吻合。

以上两篇文章均记载了《哀范君三章》全文，两相比较，文字互有出入。对此，许广平已注意到了，她在《集外集拾遗》中该诗所附的“广平谨案”中说：“知堂先生的《关于范爱农》所录诗三首，题云《哀范君三章》，其中有数字略异：如第一首竟作遽；第二首已作尽，寒作彤，黑作恶，冷作冽，涤作洗；第三首茗芋作酩酊，成终作终成。”显而易见，许广平编辑《集外集拾遗》时依据的是许寿裳《怀旧》一文所录，周作人《关于范爱农》一文所录仅作参考而已。这似乎欠妥。如果对许寿裳与周作人的文章作全面比较，就不能不承认周作人文更为翔实。因为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周作人记录鲁迅诗作所依据的鲁迅手稿尚存，而且文章还证明该诗在《民兴日报》上最初发表也源于此稿。

关于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中的《哀范君三章》

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中《哀范君三章》，无疑以许广平编《集外集拾遗》为底本，但也有校改。校改有二：一是文字，二是诗题。在文字上，将第二首“故里寒云黑”中的“黑”字改为“恶”；将第三首中“大圜犹酩酊”中的“酊”改为“苙”。至于诗题，《集外集拾遗》中为《哀诗三首〈悼范爱农〉》，《鲁迅全集》改为《哀范君三章》。

问题是校改的依据。经查，《鲁迅日记》对该诗作了“录存”。1912年7月22日《鲁迅日记》载：“夜作均言三章，哀范君也，录存于此：风雨飘摇日，……！”以此与《集外集拾遗》的校改诗核对，完全一致。据此将《鲁迅日记》“录存”视为文字上校改的依据大约不错。诗题的校改则较为复杂。原因是该诗在流布过程中诗题各有不同。《鲁迅日记》录存时称《均言三章》，鲁迅抄录给周作人的手迹为《哀范君三章》，杨霁云将其中的第三首收入《集外集》时题作《哭范爱农》，许寿裳在《怀旧》一文中所记是《哀诗三首》，许广平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时在《哀诗三首》后加括号为“悼范爱农”。可见，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将诗题改为《哀范君三章》，依据的是抄录给周作人的诗作手迹。

至此，问题已十分明显，如果说杨霁云和许广平在编辑《集外集》和《集外集拾遗》时，对《哀范君三章》的收录尚限于资料等先天条件的話，那么，1981年版的《鲁迅全集》对该诗的校改就有可商之处。我的意见是，要么，诗题和文字均不作修改，如果作校改，就要依据坚实。假如有人提出，“全集”中的校改也有《鲁迅日记》的手迹为据，我依然认为可商。

《哀范君三章》的鲁迅手迹现存两种，一种是《鲁迅日记》，一

种是周作人所存手稿。两种手稿无论诗题还是文字，出入都不小。据此可以认为，两种手稿必有先后之分，又有初稿与修改稿之别，而在先的应是初稿，在后的应是修改稿。两种手稿孰先孰后？事实上，两种手稿各自均已注明：录存于《鲁迅日记》中的诗稿为“七月二十二日”。周作人保存的手稿为“七月二十三”。由于周作人当时尚在绍兴，鲁迅曾将这件手稿付邮，这可以《鲁迅日记》中付邮记录为旁证。《鲁迅日记》7月22日作《哀范君三章》后，最早致周作人信的记载在7月25日：“下午寄二弟信”。从中我们可以推测：7月22日鲁迅创作了《哀范君三章》诗作，7月23日又修改抄录一遍，7月25日随信一同寄与二弟。可见周作人保存的手稿为修改稿，时间在后。

由于许寿裳也是较早见该手稿的人，还将该诗记录在《怀旧》一文中。将《怀旧》中记述的有关内容与《鲁迅日记》相互印证，还可以作为另一旁证。这样做的前提是，首先要确认许寿裳所见鲁迅手稿是初稿还是修改稿。以许寿裳《怀旧》中所录该诗与《鲁迅日记》手稿比较，结果是与《鲁迅日记》手稿十分近似，与周作人保存手稿相差较大。可以认定，许寿裳当年所见鲁迅诗稿，系此诗手稿的初稿。还有一点可以证明，许寿裳在《怀旧》中记载，鲁迅“有一天大概是七月底罢，大风雨凄黯之极，他（鲁迅）张了伞来”，“于是给我们看昨夜所作的《哀诗三首》”。由于“昨夜所作”的时间是7月22日，由此证明鲁迅给许寿裳看诗这天应为1912年7月23日，而且是大雨天。《鲁迅日记》7月22日记载“大雨”，23日是“雨，天气颇寒”，也与许寿裳《怀旧》中关于天气的记述相吻合。而且鲁迅笔下诗作的“风雨飘摇日”，实为写实。综合几方面的记载可见，《哀范君三章》的诗作，《鲁迅日记》中录存为初稿，许寿裳所见该诗手稿系初稿的抄稿，周作人所存诗稿，在“稿后附书”中也写“昨忽成诗三章，随手写之”，所署时间为“二十

三日”，时间与许寿裳所见时间相同，但诗作内容变化较大。由此可见，鲁迅在给许寿裳抄稿送诗之后，又再次将诗稿抄录在致周作人的信中，但这次却做了一些修改，并在手稿附记中说：“如不恶，乃可登诸《民兴》也”。1912年8月28日《鲁迅日记》载：“收21日及22日《民兴日报》一分，盖停版以后至是始复出，余及启孟之哀范爱农诗皆在焉。”一并证明，周作人保存的鲁迅手稿，显然是在许寿裳见到该诗之后的修改稿，也是鲁迅作为定稿的最初发表稿。

总而言之，如果对许广平编《集外集拾遗》所收的《哀诗三首·悼范爱农》加以校改，最坚实的依据应该是周作人保存的鲁迅手稿。

关于《哀范君三章》“稿后附书四行”

现存《哀范君三章》手稿（即周作人保存手稿），诗后附有文字，周作人称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末尾，有鲁迅所署的“二十三日，树又言”。周作人是这件手稿的接收者和保存者，他在《关于范爱农》一文中回忆说：“这是信的附片，正张已经没有了。”可见，所谓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系鲁迅致周作人信的一部分。这段文字最早随《关于范爱农》一文发表，依周作人所录，内容如下：

我于范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，至今未能释然。昨忽成诗三章，随手写之，而忽鸡虫做入，真是奇绝妙绝，霹雳一声……今录上，希大鉴定家鉴定，如不恶可登诸《民兴》也。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，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。

二十三日，树又言。

许广平编辑《集外集拾遗》时，在诗后的“许广平谨案”中，将这段文字全文照录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《鲁迅全集》，在该诗的注释中照录。只是除断句和标点略有不同外，还补充了省略号的内容是：“群小之大狼狈”一句。经与鲁迅手稿的影印件核对，发现这段文字难于辨认，这或许正是周作人抄录时采用省略号的原因。现在发现的问题是，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补充的一句肯定与原文不符。为慎重起见，我翻阅了可能记载这段文字的其他书籍，终于在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的《鲁迅年谱》第一卷中发现了不同。《鲁迅年谱》注明了这段文字的来源是“据手稿”，所不同的一句是“速死豸之大狼狈矣”。现在我不敢断定《鲁迅年谱》所录文字一定准确，但可以断定《鲁迅全集》注释中所录肯定不准确。

《鲁迅全集》的注释所以存在不准确之处，有手稿难以辨认的原因，也有内容费解的原因。《鲁迅年谱》所录的这一句，与手稿在文字上相似，却似乎不通，更难理解。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。对此，周作人曾经感到棘手，也略有提示，不妨照录以供参考：“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说及，但本系游戏的辞，释明不易，故且从略，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，便是一种典故，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，想镜水稽山曾亲闻此言者尚不乏其人欤。”

对于这段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认定和如何处理。按照周作人《关于范爱农》“这是信的附片，正张已经没有了”的回忆，无论是《哀范君三章》，还是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原本是1912年7月23日鲁迅致周作人信的一部分。现存手稿鲁迅签署的“二十三日，树又言”，也可以证明这点。也就是说，所谓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分明是鲁迅的一页“残简”。可是，正是由于此信前半部分遗失，以及《哀范爱农》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，剩下的“稿后附书四行”，从此就失去了作为鲁迅书信的独立地位。不是仅仅在于“广平谨案”中，就是仅仅存在于注释中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

阴差阳错的疏忽。现在鲁迅“稿后附书四行”的手稿俱在，它与鲁迅其他文字的关系业已理清，而《鲁迅全集》中又有收入残简的惯例，应该是将它收入书信卷中的时候了。

《苦闷的象征》鲁迅译本初版时间考

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《苦闷的象征》，是鲁迅十分重视的一部文艺论文集，也是对鲁迅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艺论文集。鲁迅与此书的关系，只看鲁迅对它的翻译、译文的发表和单行本的出版，原始的记载都一清二楚。

关于鲁迅购买日文原版书。《鲁迅日记》1924年4月8日载：“往东亚公司买《文学原理》、《苦闷的象征》……各一部，共五元五角。”查北京鲁迅博物馆编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》，可知鲁迅购买的日本原版《苦闷的象征》至今仍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。目录还记有“厨川白村著，大正十三年（1924）东京改造社五十版，精装毛边，目次前页有鲁迅先生篆文章一方”。

关于鲁迅对此书的翻译。《鲁迅日记》1924年9月22日载，“夜译《苦闷的象征》开手”。当年10月10日载，“夜译《苦闷的象征》讫”。起讫日期清晰，翻译过程仅历19天。

关于这部中文译稿的发表和出版。在鲁迅翻译过程中，《苦闷的象征》的中文译稿的第一、第二部分已经开始在《晨报副刊》连载，具体的起讫时间是1924年10月1日至10月31日。单行本的初版时间，据版权页是“1924年12月初版”，这有原书可查。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期间，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《鲁迅著作版本展览》，并编印《鲁迅著作版本展览目录》。在这个目录中，